

不可多得的紅衛兵史料

● 印紅標



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賽出版有限公司，2006）。

可信的第一手資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文化大革命作為一段歷史，雖不算遙遠，研究者卻常常感到資料的缺乏。官方檔案嚴格封存，散在民間的資料也未做系統的徵集和整理，正在隨着時光的消逝而流失。在這樣的背景下，《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

記》（以下簡稱《紅衛兵興衰錄》）一書在香港出版，令研究者感到欣喜。

這本書的內容是紅衛兵首創者之一宋柏林的日記。治學嚴謹的文革史研究者余汝信為日記作註，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主要筆桿子駱小海作序，更使之增色。

一 來自紅衛兵運動的核心

《紅衛兵興衰錄》的史料意義首先是記錄了紅衛兵運動的一些重要活動。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日記的主人宋柏林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高中三年級學生、中國第一支紅衛兵——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核心成員之一、曾被推選為本校革命師生委員會成員。1966年8月18日，他與韓軍、駱小海三人作為清華附中紅衛兵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面見毛澤東並簡短交談。第一批紅衛兵（即「老紅衛兵」）失意之後，日記的主人同情並參與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的一些活動，經歷了老紅衛兵由盛到衰的全

《紅衛兵興衰錄》是中國第一支紅衛兵——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核心成員之一宋柏林的日記。1966年8月18日，他與韓軍、駱小海代表清華附中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面見毛澤東。第一批紅衛兵（即「老紅衛兵」）失意之後，他參與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一些活動，經歷了老紅衛兵由盛到衰的全部過程。這部日記未經刪節，如實地記錄了文化大革命的見聞，紅衛兵的活動和激情。

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出版物和文革後的回憶錄，都沒有「紅衛士」這個名稱。駱小海在序言中回應了宋柏林日記中「紅衛士」的說法。紅衛兵最初是否被稱作「紅衛士」？這會成為當事人和學者回憶和考訂的新問題。文革期間，清華附中紅衛兵稱該組織成立於1966年5月29日，據宋柏林日記記載，紅衛兵應當成立於6月3日。綜合幾種說法，合理的解釋是它的成立有一個過程：5月29日決定統一署名為「紅衛兵」並統一行動，6月3日正式建立組織機構。

部過程。這種來自運動漩渦的核心人物的完整日記是難得一見的。

這部日記的內容偏重於政治運動和思想活動，其風格既不同於當時流行的抄錄豪言壯語的雷鋒式革命日記，也不限於私人情感天地，而是一部如實地記錄了文化大革命見聞、思想和作為，寫給自己看的日記。其中所記紅衛兵的活動、激情、困惑、苦惱以及讀書心得，均無矯揉造作之詞，而為親見親歷的實錄、真實情感的表白，反映了老紅衛兵的政治興衰及思潮起落。

這部日記的獨特之處還在於其連貫性和完整性。日記的主人多年以來每日必寫日記，多則多寫，少則少寫，從無間斷。這對於常人來說，是非常難得的，尤其是在文革的動亂年月。《紅衛兵興衰錄》一書收錄了從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發動至1968年2月日記主人當兵離開學校，近兩年間的全部日記，無一日遺漏，並且選登了1966年1月至4月的部分日記，作為文革前夕的背景鋪墊。

特別值得稱道的是，呈現給讀者的這部日記，未作刪節，未經加工潤色，保持了資料的原貌和完整性，甚至相關人士的姓名也原樣照錄，只對部分明顯的錯別字作了糾正。目前所見到的回憶錄往往隨時代和主人地位與思想的變遷，有意或者無意地出現選擇性記憶，而目前發表的一些日記、筆記之類資料，往往由於原著者或編輯者的現實考慮而只選登部分內容，或作刪節，乃至加工潤色，從而使其史料價值打了折扣。

二 老紅衛兵興衰 的忠實記錄

這部日記從一個核心成員的角度，記錄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興衰，其中關於名稱和成立時間的記載，是以往紅衛兵研究者所未見的新資料，也提出了新的問題。

日記從1966年5月25日以後就不斷提到後來組成紅衛兵的激進學生的活動，特別是對清華附中校領導「資產階級教育方向」的批判。1966年6月3日的日記第一次談到這些學生正式建立了自己的組織機構，但是這個組織被稱為「紅衛士」而不是「紅衛兵」。這一天的日記寫道：

中午我們「紅衛士」的一部分戰士到圓明園去開會，正式建立起組織機構，訂好了反攻計劃。

就筆者所知，以往的各種資料，不論是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出版物還是文革後的回憶錄，都沒有出現過「紅衛士」這個名稱。駱小海在為這本日記所寫的序言中，回應了「紅衛士」的說法。紅衛兵最初是不是被稱作「紅衛士」？這會成為當事人和學者回憶和考訂的新問題。

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的日期也由於這部日記增加了新的說法。文化大革命期間，清華附中紅衛兵稱自己的組織成立於1966年5月29日，文革以後的回憶也多持這個說法。據宋柏林上述6月3日日記記載，紅衛兵應當成立於6月3日。綜合駱小海為這本書所寫的序言及以往的幾種說法，合乎情理的解釋似乎是：

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成立有一個過程，5月29日決定統一署名為「紅衛兵」，並統一行動，而正式建立組織機構是在6月3日。

日記中還有多處內容印證了回憶錄提到的史實，特別是一些老紅衛兵不為外人所知的思想活動。例如：1966年12月16日的日記反映了老紅衛兵政治失意後的苦悶和徘徊。日記的主人看到歌頌紅衛兵的文藝表演，「回想起『8.18』前後的壯景，對比現在油然而觸傷感。回家看到陳伯達、江青對北航『紅旗』的關門講話，我又不禁想起『8.6』在天橋劇場江青、康生等同志對我們關門講話的情景，油然而生傷感。又看主席詩詞，陳老總的解釋，不禁落下淚來。」

日記對「聯動」1966年12月26日大會上紅衛兵的情緒也作了相當客觀的記錄，反映出當時中學老紅衛兵的狀況：

用腦子的人都對形勢有較正確的了解，不反文革（指中央文革小組——引者註）。但絕大多數還是嚙不下這口氣，迫於形勢，雖也不敢大反，但一有風吹草動，一聲半呼，就都躍躍欲試，一呼百應。但大都是為出出氣，真正傻瓜的很少，總之絕大多數仍在彷徨之中。

這次會議的組織者、策略派本來還寄一線希望於通過「破私立公」來爭取中央文革小組的諒解和支持，但是被「嚙不下這口氣」的紅衛兵打亂了議程。對此，以前已有卜大華等人的回憶，現在在宋柏林日記中得到證實。

日記中諸多此類記載，為紅衛兵運動和文革研究者，提供了考訂和考察歷史事實的重要資料依據。

三 家長的影響

《紅衛兵興衰錄》這部書完整地保留了日記的本來面貌，使人們得以了解影響紅衛兵發展的不少有價值的細節。例如，紅衛兵的活動與其擔任領導幹部的家長的關係，是當時人們猜疑很多但缺少直接資料的問題。這部日記提供了可信的例證。

紅衛兵是十幾歲的中學生，以領導幹部子女為核心，他們反對學校領導、挑戰工作組權威的造反活動，是不是得到家長的支持或者指點？影響程度有多大？他們大字報裏出現的某些只有黨內領導幹部知曉的內部信息，曾經令學校或者工作組領導吃驚。北大附中紅旗的彭小蒙曾經回憶說，他們與學校領導和工作組發生矛盾時，工作組曾動員家長勸阻學生，但是他們還是從私人渠道得到了不同的信息：一些高級領導幹部對他們的造反活動很是讚賞，而這些幹部並非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這本日記記錄了某些領導幹部與紅衛兵早期活動的關係，印證了人們的猜測和當事人的回憶。

文化大革命之初，日記的主人是高中三年級學生，他的父親任解放軍政治學院副院長。身為高級領導幹部的家長對兒子的政治傾向有着重要的影響，有時父母直接地給予支持或指點。

宋柏林的父親任解放軍政治學院副院長。身為高級領導幹部，其對兒子的政治傾向有着重要的影響。1966年5月下旬，激進學生與學校領導的矛盾日益尖銳，日記提到：「媽媽說我們沒有錯」。紅衛兵反對學校領導的活動發展到公開對峙，日記寫道：「爸爸很支持我們」。日記又提到紅衛兵「王銘找了孔原，熊鋼找了薄一波，還找了許多其他的老幹部，凡是找到的老幹部，都堅決支持我們幹革命」。這都證實了外間關於紅衛兵有高層背景的猜測。

日記也記下了紅衛兵家長對子女的擔心，有家長提醒他們「切不可頭腦發熱被敵人利用」。日記還出現了幹部子女從家長那裏獲取內部消息的記錄。8月2日日記記錄「從礦院附中那得到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最熱烈地支持我們的造反。」次日，王任重才代表中央向清華附中紅衛兵宣讀了這封信。礦院附中的這個抄件來源於該校學生楊冀平，其父親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北京軍區司令員。

1966年5月下旬，激進學生與學校領導的矛盾日益尖銳，5月29日日記提到：「媽媽說我們沒有錯」。6月1日之後，紅衛兵反對學校領導的活動發展到公開對峙。6月4日日記中寫道：「爸爸很支持我們」。6月5日日記說：紅衛兵「王銘找了孔原，熊綱找了薄一波，還找了許多其他的老幹部，凡是找到的老幹部，都堅決支持我們幹革命」。這些日記，證實了外間關於紅衛兵有高層背景的猜測。

工作組進校以後，紅衛兵與工作組發生分歧，日記記錄了家長對紅衛兵的支持和忠告。紅衛兵不同意工作組所強調的團結大多數學生的口號。6月23日的日記記錄了父親的談話，表示在清華附中這樣的學校，團結95%可能不太適當。6月下旬以後，紅衛兵與工作組的分歧在石油附中運動、「造反精神」的口號等問題上繼續發展。從日記裏可以看到父母讚許紅衛兵在石油附中問題上的態度，對「造反精神」的口號之爭，也表同情。

日記也記下了一些紅衛兵學生的家長對子女的擔心：在紅衛兵張小賓家，「他媽媽和我們談了許久，讓我們好好學習主席著作，好好學習《人民日報》社論，切不可頭腦發熱被敵人利用。」(7月7日)

日記裏還出現了一些幹部子女從家長那裏獲取內部消息的記錄。7月11日日記說，清華附中紅衛兵通過父輩的渠道，得知內部《工作通訊》十七期刊載了本校工作組關於紅衛兵的負面報導。後來，紅衛兵批評工作組的大字報引述了這期《工作通訊》的內容。

這些來自上層的小道消息使紅衛兵有恃無恐，也使清華附中等學校工作組感到與這些有高幹背景的紅衛兵較量並非易事。

幹部子女的家庭內部消息優先於中央正式傳達渠道的又一個例證是，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首先通過幹部子女傳到紅衛兵之中。8月2日日記記錄「從礦院附中那得到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最熱烈地支持我們的造反。」次日，王任重才代表中央向清華附中紅衛兵宣讀了這封信。礦院附中的這個抄件，來源於該校學生楊冀平，楊冀平的父親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北京軍區司令員。

高級幹部對紅衛兵的態度，說明黨內對於文化大革命認識不一，不少幹部在運動開始時還抱着期待。這些領導幹部既希望子女按照毛澤東的教導，在運動中「經風雨、見世面」，邁出成長為「接班人」的第一步，又擔心這些未諳世事的孩子在政治風浪中「被敵人利用」、跌跟頭，因而以自己的經驗給予指點，甚至支持，但是其結果往往出乎意料，其中的是非得失是應當正視並認真總結的。

談到這些與重大社會政治活動有關，卻屬於私人領域的事情，不能不對日記主人坦誠直面歷史的勇氣感到敬佩。大凡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在那個年代，大多數人並不是一貫正確的，很多人往往既是運動的參與者或者加害者，又是運動的受害者，只是加害和受害的時間不同、問題不同、程度不同。如今，紅衛兵的作為早已為社會所批評、譴責，而要防止悲劇再

度發生，必須分析歷史事實。這部日記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病理標本。勇敢地把記錄了自己思想和經歷，包括明顯錯誤和荒謬的日記，無保留地展示給世人，供人們分析評說，若無坦蕩的胸襟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是做不到的。對此，歷史學者懷着敬意。

四 獨具匠心的編輯和註釋

《紅衛兵興衰錄》一書的編輯和註釋，獨具內行之匠心。

首先是編輯者余汝信先生堅持保留了日記的原貌，使之免於刪節之憾。這一點前文已經談過。宋柏林的日記是一份罕見的歷史資料，正如作者〈後記〉中所說：

本人在運動中沒有受到大的衝擊，沒有成為「專政」對象，沒有被抄家，所以能夠毫無顧忌地寫出自己的真實思想並完整地保存下來，還有許多照片和文物，這在那個「紅色恐怖」的年代實屬難得。

其次，編輯者對日記做了詳細且專業的註釋，為讀者釋疑解惑。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旁人讀起來不可避免地有費解之處。編輯者的註釋為讀者作了十分到位的解釋。這需要對文化大革命背景知識的細緻入微的掌握，也少不了對日記主人的細心詢問。

例如：日記中寫到與工作組的矛盾時，幾次提到「張田豐」，如果不是編輯者指出，讀者很難猜出這是隱語，指代工作組；「張」指清華

附中工作組長章建華、「田」和「豐」分別指成員小田和小封，如果按照字面將其當作一個人名，就不會理解這個「張田豐」的重要性。這是只有日記主人才能說得清楚的問題。

編輯者對日記中出現的諸多人名、簡稱、外號、專用詞語做了說明。例如清華附中預科班的設置與眾不同，高631、高632、預641和預642同為高三年級，不知詳情者常常為之疑惑，有了註釋則一目了然。編輯者特別對日記主人來往較多的同學朋友的家庭背景、家長官職做了說明，這就使人很清楚地看到，日記主人的同學朋友圈子，主要是軍隊高級幹部，多為少將和中將一級幹部的子女。這對於準確理解日記主人的社會環境，理解日記所反映的情況無疑是重要的。

編輯者的多處註釋指出日記中的誤傳，表現了編輯者對史實的準確把握。例如，編輯者指出1966年6月19日日記中抄錄的毛澤東語錄和12月16日抄錄的毛澤東詩詞當中，有一首是當時廣泛傳播的偽託和誤傳之作。類似事例還有編輯者指出1967年5月17日日記關於中央對內蒙運動的指示是失真的消息。從書中的大量註釋，足見編輯者余汝信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獨到的學術功力。

其三，《紅衛兵興衰錄》請駱小海作序，也是成功之舉。駱小海是清華附中紅衛兵最主要的發起者、負責人之一，與卜大華、鄺桃生被並稱為「卜駱鄺」，又是主要的筆桿子，是〈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等著名紅衛兵大字報的執筆者。駱小海是紅衛兵運動一系列重要事件的關鍵性

宋柏林在運動中沒有受到大的衝擊，沒有被抄家，所以能夠毫無顧忌地寫出自己的真實思想並完整地保存下來。此外，編輯對日記做了詳細且專業的註釋。此書請駱小海作序也是成功之舉。他是〈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等著名紅衛兵大字報的執筆者。其詳細述說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知情人，這是他第一次如此詳細地述說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歷史，不僅對於理解這部日記十分必要，並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最後，書後附錄的幾篇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文章，註明了版本出處，也是一般讀者或研究者不容易見到的。

說到不足之處，本書保留了日記的原貌，僅對某些明顯的錯別字做了訂正。就歷史資料而論，如果編輯者能在訂正之處逐一加以註釋，就會更加完滿，更具可信性。

相信這樣一部不可多得的資料書，會贏得紅衛兵及文革研究者的重視與肯定。

重構「民」史的有益嘗試

● 譚徐鋒

街頭在書中作為地點，就是成都的公共空間。街頭是城市裏兩邊有房屋的路面，逼近街頭的盡是百姓的屋檐與街沿，跨出門檻就是日常生活的街頭。書中描述的是清末民初成都街頭升斗小民的酸甜苦辣，由於自身資源的限制，共享的街頭、地壩就成為他們表演的舞台。



王笛著，李德英、謝繼華、鄧麗譯：《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一百多年前，浪跡東瀛的梁啟超曾感嘆中國古史往往聚焦於帝王將相，對百姓的記載卻常付闕如，提倡寫「民」史。雖然任公先生當時的關懷有點兒「別有用心」（初衷不一定是想提升史學），但從這一想法的提出到現在為止，國人關於「民」史的成功之作似乎還不多見。王笛先生的近作《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以下簡稱《街頭》），無疑是製作「民」史的有益嘗試，當然他不一定就是有意在呼應任公先生的主張。

「街頭」與「文化」的對接應該是王先生的發明，儘管先前有美國社會學家懷特 (William F. Whyte) 的《街角社會：一個意大利人貧民區的社會結構》(*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融入「街角」去觀察一幫社